

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第一辑

下册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资料室

目 录

-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总理在国统区的斗争
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选载） 龙飞虎（31）
伟大的战士 火热的斗争（节录）
——回忆周恩来总理在西安事变到抗战胜利期间
国共斗争几次重大事件中的光辉事迹
 颜太龙（55）
忠诚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节录）
（61）——记敬爱的周总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
重大贡献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等（68）
战斗的岁月（节录）
（69）——摘自《陕西日报》，《教海刻心中 音容在
眼前》 (77)
革命情谊山高海深
——介绍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互相转赠的一条毛毯
(77) 毛毯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林志常（79）
跟随周总理的日日夜夜 老红军战士刘九州（82）
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和长沙
（83）——节自郭沫若：《洪波曲》 (94)
江河万古流，业绩代代传（节录）
——缅怀敬爱的周总理在武汉地区的部分革命实践
(94) 崇 吴瀚闻（101）

- 片断的回忆 永远的怀念 蔡馥生 (106)
永远怀念周总理 誓将遗愿化宏图 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 (114)
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日子里
沈阳部队后勤部某部部长 蒋泽民 (118)
敬爱的周总理鼓舞我们前进
桂林市文管会 (123)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筹备处
敬爱的周总理战斗在重庆
——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钱之光 (131)
难忘的回忆 光辉的形象 (节录)
——忆敬爱的周总理在曾家岩五十号的片断
左仲平 (147)
山城人民永远怀念周总理 (节录)
《四川日报》记者 (154)
到底人民胜 红岩不枉居 (节录)
——驻重庆某部指战员瞻仰红岩村缅怀敬爱的
周总理 《解放军报》记者 (160)
心中的碑 (节录) 曾 克 (163)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节录) 楊 超 (166)
敬爱的周总理与《新华日报》 (节录)
原《新华日报》在京部分同志 (176)
“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节录)
——回忆周恩来同志领导《新华日报》进行的斗争
戈宝权 (185)
敬爱的周总理领导下的《新华日报》 田伯萍 (191)
雾重庆的文艺斗争
——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张 颖 (203)

敬爱的周总理，人民战士永远怀念您（节录）

——瞻仰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

………安徽省军区某部 胡方松 黄立明 王从瑞（217）

云岭春早

——忆周副主席视察新四军军部

………驻沪空军部队 蔡 园（220）

一次难忘的航行

——随同周总理从延安到重庆……………（223）

难忘的旅程……………卓列兵（227）

我们永远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中共延安地区委员会（233）

铭记周总理亲切教诲 学习周总理革命精神

……………张汉武（238）

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

……………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 石玉璽（243）

梅园新村之行

——节自郭沫若：《南京印象》……………（246）

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

……………南京市博物馆 南京市文管会（248）

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

——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南京梅园新村的英勇斗争

……………新华社记者（258）

永垂史册的战斗（节录）

——《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补记

……………南京市博物馆（267）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节录）

——回忆在梅园新村工作在周总理身边的日日夜夜

……………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 肖 鹤（275）

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节录）

- 中共上海市卢湾区瑞金街道委员会 (279)
宣化店人民缅怀敬爱的周总理 (节录) (281)
在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日子 (节录) (282)
原周恩来总理警卫人员 (284)
敬爱的周总理在转战陕北途中 (285)
《陕西日报》通讯员、记者 (289)
周副主席跟随毛主席在陕北 (290)
——节自闫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296)
怀念周总理 学习周总理 (节录) (297)
中共西宁市委书记 康世昌 (299)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王鸿博 (303)
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挂心上 (304)
——选自《陕西日报》：《缅怀周总理丰功伟绩》 (305)
紧跟华主席继续革命 (308)
一件往事 兰州市汽车修配厂革委会副主任 王保成 (310)
在周总理随同毛主席走过的路上 《山西日报》记者 (313)
难忘的回忆 深切的怀念 (314)
——忆周总理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某医院工作和
对伤病员的热情关怀 魏明中 (324)
英名千古在「党史发奇光」(摘录) (325)
长沙师范学校 姜国仁 (330)
第一面“八一”军旗的诞生 邵 兵 (332)
敬爱的周总理在西柏坡 平山县西柏坡大队党支部 (334)
周总理在开国前后 (335)
——摘自杨超：《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337)
深情忆念周伯伯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 朱 敏 (344)
深切的怀念 王炳南 (353)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 周总理在国统区的斗争

许 涂 新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同同志们一样，为失去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感到无限悲痛！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去年这个时候，狠毒地剥夺了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总理的政治权利，禁止全国人民追悼周总理的集会，砍掉人民追悼周总理的宣传报导。“四人帮”的这种反革命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反映全国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根本利益，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就为我们现在能够大规模地隆重纪念周总理，提供了政治前提。想到这里，我们更要衷心地拥护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要衷心地感谢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战斗、波澜壮阔的一生。我无能力、无条件来全面地完整地介绍周总理的生平，我只能把我 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的情况，向同志们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周总理在抗战初期坚持持久战的斗争

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周恩来同志是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和长江局的负责人之一，在党外，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副部长。他不仅要抓长江局和武汉群众运动的工作；而且还要用相当多的时间，去同国民党搞统战，去推动国民党军队抗战，去抓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张国焘在武汉叛变前，周恩来同志同他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张国焘叛变以后，周恩来同志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做报告，他除了从历史上分析张国焘长期反党活动和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外，还谆谆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入党之后，必须认真改造自己。张国焘是一个带着资产阶级野心混入党内的人，入党之后，一点也没有改造。张在四方面军大搞军阀主义，在长征途中，大搞分裂党、另立中央和谋害毛主席的罪恶活动。这些都是他的资产阶级野心的暴露。他的这种野心没有得逞，就叛党投敌，充当敌人的鹰犬。周恩来同志的分析，使编辑部许多同志震动起来，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真理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证明。以前不说，解放后的二十多年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等反党集团，不都是资产阶级野心的大暴露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的资产阶级野心，那就更加疯狂，何况江张等人早已叛党投敌，早已充当敌人的鹰犬呢？在武汉时期，除了反对汉奸的亡国论之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持久战与蒋介石、王明的速决战的斗争。周恩来同志是坚决捍卫毛主席关于持久战的科学论断和正确路线的。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压迫人民、不许人民抗日的反动政策，使战局迅速陷入逆境，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上海、太原和

南京，相继沦陷。日本强盗的铁骑，在华北和华中的国土上，横冲直撞。抗战前途，象一块磐石，沉重地压着每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兴亡的人们的胸膛！

为了指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方向，为了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积极起来参加抗战，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了具有高度的科学预见和重大历史意义的巨著《论持久战》。毛主席在这一部巨著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军事情况，指出了战争必胜前途，但战争必然是持久而不能速胜。中国只有依靠人民战争的方针，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毛主席指出，持久战包含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为了坚持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毛主席指出，必须动员全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战争的自觉的能动性，必须开展敌后游击战并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毛主席指出：“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由于抗战的“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使全国人民感到无限振奋，使全国人民认识到抗战的长期性而必须艰苦奋斗。

但是，国民党所唱的，却是另一种调子。汪精卫、陈公博一派，在武汉时期，就公然宣扬“抗战必定亡国”，抗战必定使全国成为焦土等汉奸言论。汪精卫这一伙，后来终于叛国投敌去了。蒋介石那一伙呢？他们不仅继续压迫人民，不许人民起来抗日，而且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暗中同日本密谈，准备妥协投降。但在表面上却高唱什么速胜论，胡说很快就可以挡住敌人的进攻，并转入反攻，收复失地；胡说抗战只有敌进我退和反攻两个阶段。政学系的《大公报》希望用几个台儿庄一

类的胜仗，就可挡住日本。台儿庄战役是什么呢？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国军队以四十万人对日军七、八万人的压倒优势，因而，得到胜利。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样的会战是不可能经常进行的。《大公报》的那种论调，只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罢了。国民党的其他报纸，如《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等等，也在所谓“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之下，反复地贩卖速胜论的货色。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反动言论，对于当时抗战，是极其有害的。他们都是国民党反动头子。对于进步分子和广大群众，他们所唱的那些调子，都是容易看穿的。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当时身为第三国际主席团委员和我党长江局书记的王明（陈绍禹），却同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卖力地宣传“抗战速胜论”。王明的“抗战速胜论”是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引伸出来的。王明看到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的暂时弱小和国民党在表面上的暂时强大，就错误地断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并且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王明胡说抗战顶多只打四年，胡说抗战只有敌进我退和中国军队反攻两个阶段。王明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外，在许多座谈会上，反复地贩卖他的这一套投降路线和速胜论。在他的这种胡说之下，许多人在思想上又混乱起来了。到底抗战的前途是什么呢？到底抗战将经过什么途径而达到胜利呢？到底抗战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呢？是单纯依靠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在我党领导下发动全国人民群众起来抗战呢？随着日寇“沿江跃进”攻势的深入，特别是马当失守之后，全国人民，特别是武汉人民，在思想上，就更加混乱，一时，悲观情绪也就在各个角落里，增长起来了。

为了澄清国民党和王明对人们思想造成的混乱，扭转人们的悲观情绪，周恩来同志昂然站出来捍卫毛主席关于《论持久战》的科学论断和抗战的正确路线，昂然站出来回击、粉碎汪

精卫、蒋介石和王明的反动谬论。一九三八年七月至十月间，周恩来同志先后在长江局会议上，在《新华日报》编辑部报告会上，在政治部第三厅的报告会上以及在武汉文化界的多次座谈会上，用斩钉截铁的语言，以气壮河山的气概，向党员干部，向党外朋友，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日本强盗既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赶到中国的‘堪察加’，追上昆仑山；我们也不可能很快的转弱为强，反守为攻，将日寇强盗赶出中国。因此，抗日战争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争取最后胜利。他描写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即是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换一句话说，中日战争既不是一个阶段被敌人一直进攻到我们亡了国；也不是两个阶段，敌人中止进攻后，被我们一个反攻，把日寇打出中国去，而是三个阶段，先是敌进我退，继而彼此相持，最后我进敌退，我们取得最后胜利。”周恩来同志重申毛主席的持久战的科学论断，再三地指出，“武汉的得失，决不能解释为能否长期抗战的关键”，“即使武汉不保，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第二阶段的到来。”周恩来同志用这样精辟的分析，有力地批判了汪精卫等人的一个阶段的汉奸亡国论；同时又批判了蒋介石和王明的二个阶段的速胜论。这就使当时在一部分群众中流行着的悲观心理和侥幸心理，得到扭转。

根据抗战初期敌强我弱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这一情况，周恩来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强调必须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并且指出：只有发展敌后游击战，才能拖住敌人。他说：“敌人以强渡黄河，割断西北来困难我们，我们应以黄河两岸的积极行动，敌后的更多活动，抓住敌人不使深入。”“敌人

以首先打击晋察冀边区，来沮丧我们对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应该以坚持华北游击战争，保卫晋察冀边区，特别是在全国战区敌后发展更多的游击根据地，来回答敌人的围攻，来吸引更多的敌人回攻敌后。”并且指出，我们应该“在广大的敌后游击区生长更多的正规部队”。周恩来同志的这种论断，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指示的，给王明的抗战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的投降主义路线，以严重的打击。

周恩来同志对于当时抗战形势的分析，在长江局中，得到叶剑英同志、董必武同志和邓颖超同志的大力支持。我多次听到周恩来同志关于持久战的报告，也多次听到叶剑英同志关于持久战的报告。周恩来同志在反复做了报告和发言之后，以社论形式，在那一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八日、九日连续三天，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那时，距武汉的撤退，只有半个月，敌人的铁骑，已经迫近阳新和蕲州。武汉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党报这三天连续登载的社论，使人们冷静地重新认识到：抗战是长期的，是持久的；即使武汉撤退，只要艰苦奋斗，抗战前途，还是光明的。党内许多同志，党外许多朋友，特别是《新华日报》采访部的读者反映，纷纷要求周恩来同志把这篇社论，作为小册子出版。这个要求，周恩来同志接受了。几天之后，《新华日报》就预告：周恩来著：《论目前抗战形势》小册子，快要出版。但是，这本小册子来不及在武汉出版，因为那时日寇的坦克，已在隆隆的炮声中逼近武汉；《新华日报》的同志，只留下一小部分坚持工作（直到敌人进占武汉的前一天，十月二十四日，还照常出版）；其余同志，分批退出武汉。但在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撤退后的十天，这本小册子就在重庆问世，成为重庆和各地群众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重要参考文献，成为广大坚持抗战的爱国群众的心爱

读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如毛主席的英明预见，是经过三个阶段的持久战而取得了最后胜利的！周恩来同志在捍卫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坚持持久战正确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皖南事变前后周总理在重庆的战斗

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前后，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重庆，面对着蒋介石国民党所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进行了大无畏的、英勇而机智的战斗。

蒋介石为了削弱抗战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就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强迫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在一个月内一律开赴黄河以北。这个反动命令，只有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因为从华中调开抗日人民军队，就是拔掉日本的眼中钉，就是为投降妥协扫清道路。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根据毛主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三原则，向国民党进行交涉，指出这个命令是对抗战的严重破坏，但是，为了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和坚持抗战，答应新四军一部分开赴长江以北。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当原住在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万余人部队，正在向北移动的中途，蒋介石国民党以八万余人的精锐部队，突然加以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地抗击了七昼夜，终于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终于因仓促应战，九千多名抗日战士，无辜地在茂林地区牺牲了！军长叶挺也在抵抗力竭之后被捕入狱！蒋介石被“胜利”冲昏头脑，悍然在一月十七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乌云满天，北风狂啸，抗战大局，差不多是摇摇欲坠了。

“皖南事变”的消息，南方局是在一月十日前后知道的。

针对着国民党的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周恩来同志亲自写了一篇“团结起来打敌人”的“代论”，同时，命令《新华日报》（我党在国统区的党报）发表“皖南事变”真相的报导和一篇反对国民党政府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的评论。然而，这篇报导和评论，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押了。周恩来同志在怒火燃烧中题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一首不朽的四言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一题词和诗，对国民党来说，是一把插进它的胸膛的钢刀；它当然不会准许我们在党报上发表的，因此，我们并不送审，而是采取“硬登”的办法。这就要注意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党报的袭击。果然，在十七日夜间，它的新闻检查所所长带了大批军警，如临大敌般的到化龙桥党报编辑部来监视，来检查，并且在编辑部和印刷部的周围，布下了层层封锁线。来者不善，党报的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早就做了思想准备的。编辑部和印刷部的同志，准备好两个新闻相当平凡的版面（第二和第三版），并把清样送给这位国民党老爷审查，他拒绝看清样，一定要看印好的报纸。我们只好在这两个拼好的版上，打纸型，浇铅版，并且印出一些报纸来，送给那位老爷，他看完后，认为没问题，就回家睡觉。当他在看报时，同志们急速地拆掉烫手的版面，急速装上周恩来同志的题词和诗的木刻版，急速打了纸型，急速浇了铅版，急速送到设在防寒洞里的印刷所去印刷。天还未亮，那张有题词和诗的报版，已经印成报纸了。那一批由党报培养和训练的“报童”（送报员），一个个都成了生龙活虎的侦察兵，一个个都把用各种形式化装起来的党报，手提背负，机警地闯过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封锁线，在天亮不久，送到城内，达到江北，送到南岸，送到沙坪。

坝去了。

当时重庆的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的；《新华日报》这一天（一月十八日）的报纸，就象一颗炸弹，在这座山城上爆炸开来。国民党反动派发现这一情况，气急败坏地大打出手，警察、宪兵、便衣特务，纷纷出动。他们不仅封锁了全城邮局，而且象疯狗一般，扑向城内，扑向江北和南岸，追袭我们的“报童”。这些英勇的小战士，大义凛然地同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有的被捕了，有的被打的头破血流，但还是英气勃勃地回到党报发行部来！

周恩来同志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之后，连日向蒋介石、何应钦提出抗议。何应钦还以所谓“军令”为借口，把种种罪名，加在新四军身上，周恩来同志针锋相对地戳穿了何应钦的诬蔑，用火一般的语言，指出新四军军部是在接受“军令”而在北上途中，受到国民党强大部队的突然包围袭击的。国民党一面强令新四军北上，一面又用八倍于新四军军部的兵力，在新四军北上途中，事先布置一个包围圈，进行歼灭。这个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滔天罪行，国民党能推得掉吗？赤胆忠心，积极抗战的新四军，有什么罪过？这种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在军警森严、甚至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中进行的。那天，党报同志把情况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之后，他除了向重庆的军警负责人张镇提出抗议，并令其立即释放被捕的“报童”之外，挺身而出，拿下了当天党报，到上清寺、两路口等处，沿街大声的叫卖；党报营业部、采访部和编辑部的同志，也纷纷跟着上街卖报。就这样，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把这一天抗议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罪行的《新华日报》，送到山城广大的读者手中。周恩来同志这一天沿街卖报的消息，象雷电一样，震撼了这一座蒙着浓雾、沉沉欲睡的

山城；许多外国记者都为这一没法想象的新闻所震动，而在这座山城里，上坡下坡地奔波着。

周恩来同志对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干部，反复地进行了时局分析和阶级教育，反复地指出，“皖南事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的反动路线的必然表现；而从新四军当时的领导人项英来说，却犯了不可救药的路线错误。项英不执行毛主席的有团结、有斗争，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相结合的革命路线，而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对蒋介石国民党抱着无穷的幻想和信任，从而，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完全解除了武装，完全丧失了警惕，终于使九千多名英勇的抗日健儿，无辜地在茂林地区流尽了鲜血；他自己呢？也就在这个血泊中倒下去了。接着，周恩来同志在南方局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为我们讲党史，系统地为我们做党内路线斗争的报告。他反复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党、中国的革命，如果离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那是不可思议的。毛主席多次在局面极端困难、极端艰险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革命绕过巨礁，~~去~~克服困难，从胜利走到更大的胜利！

为了防备国民党蒋介石搞全面破裂，搞突然事变，为了尽量减少党和进步力量的损失，南方局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有计划地把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分别送到延安、苏北和香港南洋，还有一些转入西南内地，找公开职业掩护，这样，留在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坚持工作的只有一小部分干部。对于这一部分留下来坚持工作的干部，周恩来同志反复地进行阶级教育，不断地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节相勉励。无论在大会上，在小会上，以至在个别谈话中，总是不失时机地以先烈们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历史进行教导。他向我们谈李大钊烈士的崇高品质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他还为我们谈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及杨匏

安等同志的光辉形象。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那段时间，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警报时间也相当长，周恩来同志连躲避空袭的时间，也不放过，他经常在防空洞中，为我们讲先烈的壮烈故事。记得杨匏安烈士的一首诗，就是在躲空袭的防空洞中，念给我们听的。（按：杨匏安烈士在狱中看见罗绮园发生动摇，临别时，作诗去争取他，但罗仍叛变。）诗云：

慷慨登车去，
相期一节全。
残生无可恋，
大敌正当前。
投止思张俭，
迟行笑褚渊。
行矣自兹别，
相视莫潸然！”

周恩来同志在躲空袭的防空洞中，念给我们听的诗，有好几首，可惜我只记得这一首。

在“皖南事变”之后，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同志为副军长，继续率领抗日健儿在东南地区，独立作战。这个振奋人心的命令，《新华日报》是发表不出来的。周恩来同志令党报印刷部，印了几万份，通过秘密渠道，在国统区广泛散发；同时，他还指示南方局、《新华日报》以及地下组织的同志和朋友，进行周密调查，把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地点及其迫害、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罪行，印成单张，也通过秘密渠道，在国统区广泛散发。这些印刷品把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一部分真相，公开在广大群众面前，这就使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

在这里，要回头说一下周恩来同志对于公开宣传与秘密活动的结合问题。《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党报，因此，它的言论和发行，是受到国民党的严重限制的。在武汉时期，这种限制已经出现，但是，问题的严重，是